



新冠肺炎 深度

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写“言论自由”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什么

一个行动者反驳：“跪着还要搞革命。”这句话反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谁说我们要搞革命了？你不要乱说。”

端传媒记者 来福 发自香港 | 2020-02-25



“我要言论自由”抗议运动中的部分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2月6日晚上11点，阿果和朋友在线上玩狼人杀，“预言家”发言时，突然说了一句：“为武汉受难的同胞默哀8秒钟。”直到退出游戏，阿果才知道——被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刚刚不治去世了。

阿果23岁，最好的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以一个摇滚乐队乐迷微信群为阵地。这个群有着鲜明的“反叛”色彩，平日除了聊音乐，也讨论公共事务，女权运动、计划生育政策、香港反修例运动，聊到炸群，又会在半小时内快速重组。

当晚，朋友们正在群里对李文亮的死亡表达悲伤和愤怒，李文亮的死讯却突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中国新闻周刊》当晚11点56分发出即时新闻，指李文亮仍在抢救中，而一个小时之前，《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已经在微博确认了李文亮的死亡。一时之间，数以万千的中国网民都在求证：李文亮究竟已经去世、还是正在抢救？

“人已经死了，为了平民愤，又送进ICU。”一向激进的猫子在群里说。彼时，群里的活跃分子们已确认“要制造点浪花，不能就这么算了”。有人提议在口罩上写字，李文亮被迫在训诫书上写下了“能”和“明白”，他们要在口罩上写“不能，不明白”来悼念他。

阿果记得，只有一个人提出反对，他说：李文亮是否已经去世还不清楚，就算他死了，也不应该做这样的行动，有消费死者的嫌疑。猫子记得，那个人还说，为了平息民愤而对李文亮进行“表演式”抢救是很不人道，但若不是他们这么愤怒，政府也不会这么做。

“李医生的死，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多默回应道。相比多默，群里其他人对反对者的回应就没那么客气了，后者被骂急了，连续刷了五、六条消息：有本事你们上街啊？你们敢上街吗？我明天上街，有没有人敢和我一起去？

如今回看，群里的一些成员认为，可能是密集出现的“上街”引起了网警关注，才有了后来的集体“喝茶”。尽管发言者已被群主踢出，但他恼羞之下提出的问题——“你们敢上街吗”则变成了一个不时浮现、难以面对的困境——对它的理解，成为行动者之间最重要的分歧。



2020年2月7日，武汉医院后湖分院外，一名男子在鲜花面前鞠躬，纪念已故的眼科医生李文亮。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母亲和他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由父亲拍照

23岁的猫子是从乐迷微信群得知李文亮死讯的，尽管他家就在武汉汉口，距离李文亮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只有几公里远。

“中心医院离我家很近，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会经过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去世了。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边时，你唯一的判断是，感觉很不舒服，应该做些什么。”

武汉封城之后，猫子一直待在家里，看书、打游戏、跟女朋友打电话、煲汤，也看到大量的病人求助信息。尽管身处疫情的起始点，但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病人，他并不比外界知道得更多。

母亲有很多朋友都确诊了，她会在饭桌上分享一些新闻上没有的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他有一个阿姨出现了症状，迟迟未能确诊，绝望之中向他母亲倾诉：“就这样让我去死吧。”猫子听到语音，难受了很久。

家里找不到纸笔，猫子临时用一支毛笔，在餐巾纸上写下口号，举在手上，请母亲给他拍照。最后的照片，是母亲和他各自戴着口罩，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由父亲拍摄而成。

母亲的加入让猫子有些意外：“如果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被官方抓捕，我妈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李文亮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一个医生，因为一种朴素的道德感而说了两句真话，但连这种道德感都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她决定加入我。”

与此同时，从“狼人杀”游戏中下线的阿果陷入了疫情以来的第三次崩溃。

他住在湖北孝感一个小镇，湖北封省后，阿果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游戏世界里，偶尔往现实世界望一眼。除夕夜，阿果一直在转发微博上的求助信息，“特别灰暗，到处是人间惨剧。”他说，当晚看到新浪微博还在删求助帖，怒火中烧，发了一条朋友圈诅咒删帖员；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建议最高领导人在春节晚会上给大家磕头谢罪。激烈的言论引来一位公务员朋友的惊诧，阿果后来删掉朋友圈，他说，一方面是有风险，另一方面也觉得似乎不能完全怪那一个人。

另一次情绪爆发是1月31日晚上，《人民日报》转发报道，称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小镇里很多人连夜去药店排队购买，阿果难受无比：“（他们）现在还在想利益。”（[点击阅读《“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

大二时，作为“一个普普通通大学的化学系学生”，阿果对前途感到迷茫，开始看西方哲学，思考一些大问题——宇宙的起点、自由意志、绝对精神、人的存在。康德一度很鼓舞他，人是自由的，世界是有目的的。

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也让他在公共议题上具备反思能力。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举报班主任之父性侵事件时，他也很气愤地在微博上声援。而中学时期，阿果还是一个会在钓鱼岛问题上发“虽远必诛”的人。

夜里一点多，阿果删了游戏，一边抽烟，一边听难受的音乐，找到一张白纸，写下“不自由，毋宁死”，举在手上自拍，但是效果不好。郁结之中，他又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血债血偿，天灾不等于人祸。”他打算第二天把这句写在纸上，拍照。



2020年2月8日，台北的民众悼念李文亮医生。摄：陈焯辉/端传媒

此前不久，四川宜宾的多默告诉母亲李文亮去世的消息，母亲没什么反应，尽管在意料之中，多默还是有些失望。

多默1月底就知道了李文亮的事。“他是法律上没罪，但是在政治上却被宣告有罪的人。”除夕夜，压抑之中，多默写了一段话：“我想，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救赎与希望，多年来臣服于红色的旗帜与信仰，我的过去与未来，似乎早已经注定。”

中学时，多默在学校门口看见几十个人追着一个人打，警察过了很久才过来，也只是站在一旁劝阻。这种恃强凌弱的暴力，在县城是家常便饭。另一种暴力更隐秘，家族里有一些亲戚在政府中工作，多默从小就看到许多腐败和寻租，甚至是间接的获益者。

“这个国家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好。”他在中学时期就意识到这一点。那时他开始听崔健、罗大佑、李志的音乐，顺着他们的歌曲关注历史和政治事件。反右、文革、六四、雨伞、太阳花、反修例……他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公民必须要铭记的，多默还相信一句话——“政府始终是为公民所服务的。”

在疫情进入普通民众视野前，多默就觉察到了不对劲。他是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从新闻上看到一个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新病毒被发现时，就断定情况会很严重。他提醒老家的朋友注意防疫，批评政府隐瞒消息，遭到朋友攻击。“他们说，我是为了反对政府而说出这些话，是一个恶意抨击政府的人。”

自去年6月香港反修例运动开始，这样的对话就频繁发生，多默一度希望能以政治常识和逻辑讨论香港人的抗争，但大部分同学和朋友听不得与官媒不同的言论，多默因此和很多朋友决裂。

凌晨四点，多默在一张A4纸上写下“不能，不明白”，遮住鼻子以下的部分，拍了一张照。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对李文亮的平反，是他作为公民的义务。

不过，对另一位参与者麦快乐来说，仅仅为李文亮平反，是不够的。

“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

“在口罩上写下如‘言论自由’的字样，可以的话，再在一张纸上写下更多的诉求，然后戴上口罩，举诉求，拍照传播以抗议。”倡议者没有解释为什么要以“言论自由”作为诉求，不过不少参与者认为，大家有一个共识——这场悲剧的起点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麦快乐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让他们意识到“因言获罪”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如果当时（政府）不是训诫他们，而是采取其他防疫措施，可能就不会这样，希望更多人意识到疫情不是一个天灾。”

跟其他人不同，麦快乐加入乐迷微信群的时间并不长，也不常参与讨论。李文亮去世时，她在重庆，引起她注意的是微博的超级话题“我们要言论自由”——一个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话题，却意外收获了286万人次阅读、9684条讨论。

麦快乐看见各种立场的人、包括小粉红都很愤怒，感到莫名激动，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见革命的曙光了吗？”看见乐迷群在讨论行动，麦快乐决定加入。麦快乐在群里小有名气，她立场比较激进，在此时加入，也让阿果觉得很激励。

正在读大学的麦快乐自认是“勇武派”，2019年女生节（一个发源于高校的节日，比3月8日妇女节提前一天）期间，她用打火机把学校里两条写着“与你契约终身 对你爱由心证”、“一切不服务女性的侦查行为都是不规范的”的横幅点燃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支持她，也有人认为纵火太过极端。麦快乐被辅导员批评后发了一个声明：“放火的确欠缺安全考虑，向学校道歉。我应该用剪刀来着。”



2020年2月8日，北京通惠河畔，市民前来悼念李文亮。摄：Sophie Wu

疫情发生之后，麦快乐一直过得很糟糕。除夕那天她和家人从重庆县城去了市区，在亲戚家过年，电视里播着春节联欢晚会。麦快乐觉得，“联欢”两个字已够糟了，更坏的是还有诗歌朗诵，白岩松和康辉深情款款地喊出“我们爱你们”、“众志成城”，对照她在网上刷到的求助信息、武汉朋友发来的情况，让她觉得很荒诞，而与此同时，家里其他人正在如常喝茶聊天。“那么多个人，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

麦快乐在口罩写着“不能，不明白”，手举着纸片：“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只有一种声音。”又补充了一句：“把言论自由还给我们！”

凌晨两点多，乐迷群的管理员阿北“爬楼”看完所有信息，他开始不自觉地想到一些具体场景：李文亮的尸体是不是安全，会不会被迅速火化；这个医生去世前有没有留下遗言嘱托；去世前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派出所训诫的场景……

第二天早上，家住长春的阿北跑到一个结冰的湖上，在雪地里写了一个“不”字，因为太冷，后面的“能，不明白”没有写下去。“不”字似乎也足够了，他想起自己曾经喜欢过的NO乐队，写过一些忧郁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下午四点，阿北把群里其他人拍的抗议照片，编辑了一条公众号文章，写了一段文字：“最近的事，尤其是他的离开，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我们所处的困境，我们面临的遭遇，这些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没法以嬉笑的姿态去面对，没法继续用潇洒的表达去阐释，因为要直面的是淋漓的血和真的人性。”

这条推送一直没能通过微信的人工审核。就在当天早上，阿果删掉了朋友圈那句“血债血偿”，“老实说，我确实是害怕了。”而麦快乐发在微博上的照片，被很多网民骂“废青”，随后被微博管理员删除。

“谁说我们要搞革命了？你不要乱说”

秋后算帐很快来临。抗议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传播，又很快被删除。四、五天后，身在国外的群主接到警察电话，质问他们是不是在煽动什么；一个群管理员被警察和国保

开车上门带走两次，她不再敢跟群友联络，怕牵连他们……不仅参与抗议行动的人被警察约谈，群里一些没有参与行动，也不曾在讨论期间发言的人也被警察找上门。

风雨之中，阿果和另外几个人在群里劝告：如果担心承担风险的人可以先退群。很快有几十个人退出。猫子很不满：“国家都怎么样了，还不反抗吗？”他觉得行动已经有一些进展，应该再做点什么。他预演了被警察约谈的一幕，如果警察要看他手机，他会坚决拒绝。

“如果机会允许我一定会上街游行的，我可能不会是第一个人，但是如果前面已经有了一千个人，我一定会是第一千零一个人。”猫子说。对于行动中的风险，他觉得不是愿不愿意承担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承担。他谈起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正是上一代人不愿意承担风险，才把风险转移到了这一代人。”

阿果并不太认可猫子的激愤，“如果你被警察找了，你拒绝了交出手机，你可以说，但是你还没有被找，你这样轻飘飘地要别人反抗，是一种胁迫。”

阿果没有把话说出口，泼冷水的是另一个叫橡树的群友，他觉得做到这一步已经够了，反对继续行动：“你们冒得起这个风险吗？”猫子回应：“那要不听话好了，听法西斯的话。”

“你们知道什么叫革命吗，你们知道什么叫法西斯吗，这个事情很危险，没想的那么简单，不要有什么妄想！”橡树说。

群里只有麦快乐冷冷地回应：“跪着还要搞革命。”这句话反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谁说我们要搞革命了？你不要乱说。”

抗议的照片被传播到了墙外，被CNN和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黄耀明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些照片。但是麦快乐对行动仍有一些失望，她觉得“言论自由”的诉求被模糊掉了，许多人用的口号是“不能，不明白”，尽管其中也有要言论自由的意思，但是不够明确。

女生节烧横幅的事情对她来说是第二次政治启蒙，“一开始确实是一时冲动，后来整个事情的反响对我的影响也还挺大的，我那时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要发声之外，行动也是很重要的。”

的事情。”

李文亮去世第二天，国家监察委员会宣布派出调查组到武汉，全面调查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很多人的愤怒就平息了。“他们不生气了这件事情更加让我生气。”

在微信群吵架的时候，麦快乐一度萌生了退意：“大家都是年轻人，家境也比较好，可能现在喜欢摇滚乐，愿意去反抗，但是当这个体制不停打磨你，你可能就不一定愿意做了。”而对她来说，行动只有一个目的，让这个体制发生一些改变。而如果不愿意承担风险，改变一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手绘。图片来自网络

尾声

警察打电话到阿北家时，他已经离开长春去了上海。他把电话和住址通过家里人给了警方，等待他们上门。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比生命还要宝贵，你要怎么去面对那些事情。”阿北说，这是他决定对外说话的原因。

不过，他不得不解散微信群，把几百个人一个一个踢掉。这个群过去“炸”过不下10次，每次炸群，他都会发起位置共享，那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转移到下一个群。而这次没有下一个微信群了，一个管理员被叫到派出所约谈时发来消息，群里有人举报。他们中有些人转移到了Telegram，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有些人则不愿意再参与了。

多默有些后悔，他过年前和母亲出门去采购年货，母亲极有可能是那次被感染了。她咳嗽，发烧，CT显示肺部发炎。但是在四川宜宾县城，没有条件做核酸检测，无法确诊。

他记忆中，每个冬天都是在抑郁中度过的。今年，除了突然爆发的疫情，个人的生活也难以掌控。他用吸烟量来计算自己的忧愁程度，这几个月来，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在自己才看得到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生来便是长夜的子民。”

阿果则已平复了心情，回到谈恋爱的日常生活之中，他坚持说，某种形式的反抗一定会继续的，这是他赖以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阿北整理了抗议行动中出现的照片，大概有150张。麦快乐联系了记者，她觉得记录下这一切也是一种行动。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剃发、哺乳与卫生巾：“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
2. 钻石公主号之疫：1337个房间，14个惊恐日夜
3. “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
4. 缺席的领袖身体：关于“亲自”的笑话与灾难中的政治奇观
5. 社会学家周雪光谈肺炎危机（上）：中国官僚如何失去了主见和能动性？
6. 阎连科：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7. 武汉病人
8. 武汉作为“朋克之城”：自由的头脑如何面对瘟疫、谎言与封城
9. 对话刘绍华：“防疫”中国内部，缺乏伦理的医疗技术与政治文化
10. 沙青青：疫症危机与安倍体制，战后最集权的首相如何陷入困境？

编辑推荐

1. “万家宴”落幕后，百步亭发烧了
2. 医疗旅游、国际合作与赤脚医生：泰国、越南和印度的防疫故事
3. 口罩与哨声、行动与恐慌：疫症下的欧洲华人
4. 成为科比：一个商业体育偶像的生与死
5. 从模范开局到全境失守：韩国防疫的不确定未来
6. 陈信仲：怎样的政治文化，令日本社会无法对政府形成压力？
7. 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写“言论自由”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什么
8. 病毒笼罩世界工厂：谁在越南庆幸，谁在湖北困守愁城？

9. 奉俊昊的奥斯卡与韩国电影的疯狂秘密

10. 沙青青：疫症危机与安倍体制，战后最集权的首相如何陷入困境？

延伸阅读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坏的注脚

这不仅是一个曾说过真话的个体的离去，或也是一整个中国叙事在历经一个多月的肺炎危机后，彻底破灭的象征。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吹哨人死了，但我们要把哨子保护好。”

通惠河畔的雪：在北京，人们如何纪念医生李文亮

艳阳高照，河坝上的雪还没有融化。

阎连科：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为战争胜利的万人合唱中，让我们默默站到一边，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有记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天把这种记性生成个人记忆传递给后人的人。